

History of Pedlars
in Europe

欧洲商贩史

[法] 罗朗斯·丰丹 著 殷亚迪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欧洲商贩史

History of Pedlars
in Europ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9-644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商贩史 / (法) 罗朗斯·丰丹著; 殷亚迪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

(培文书系·人文科学系列)

ISBN 978-7-301-18142-3

I. ①欧… II. ①丰… ②殷… III. ①商业史—欧洲—17世纪~18世纪 IV. ①F7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4802号

History of Pedlars in Europe by Laurence Fontaine

Copyright © Laurence Fontaine 1996

First published in 1996 by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All rights reserved. Except for the quotation of short passages for the purposes of criticism and review,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 名：欧洲商贩史

著作责任者：[法] 罗朗斯·丰丹 著 殷亚迪 译

责任编辑：徐文宁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8142-3/K·072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pw@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6.75印张 286千字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导 论.....	1
第 1 章 15—17 世纪间的小贩业与主要贸易	7
第 2 章 18 世纪——返回地区	31
第 3 章 18 世纪南欧的书商网络与书贩	46
第 4 章 一种有弹性的类型学.....	69
第 5 章 在村落中——巡回的理由和支撑巡回的结构	89
第 6 章 信贷和社会关系.....	113
第 7 章 小贩业的衰亡.....	130
第 8 章 巡回的文化.....	152
第 9 章 文明的生意?	170
结 论.....	188
附录：欧洲 18 世纪来自布里杨松内地区的书商名录	193
注 释.....	202

导 论

在近代，受教育阶级有种种定义小贩的方式，小贩也有很多广为人知的名称。它们都表达出把小贩这行明确归类的困难，以及定居居民对小贩模棱两可的感觉。在法国，这个词首先用来指那些在市镇穿梭、兜售绘画和散装印张的人。其次，由于语言有所偏离，它被用在巡游乡间的生意人身上，那时候叫小商小贩 (petit mercier/petty trader)、贩夫 (porteballe/packman)、行商 (marcelot or mercelot/wandering trader)。第一种含义指一种被认可的行业 (尽管不重要)，第二种仅仅是“无业游民”和“骗子”^[1]的另一种说法。在与英格兰的情况进行对比后，《百科全书》中写道：“历史上看，他们是挨个市镇游荡的骗子，买卖铜器、白蜡、陶器和其他类似的本该到公开市场上正规出售的商品……在法国，这样的人叫贩夫 (porteballe/packman)，巡回商人 (coureurs/itinerants)，行脚商 (mercelots/wandering traders)，二手商贩 (brocanteurs/second-hand dealers)。”^[2]

只是从 18 世纪下半叶开始，农村小贩业才赢得了一个商业地位；1762 年的《学院辞典》里，小贩在“生意人”词条下，而非只在“小商小贩”下面。不过，小贩依然是一副处于社会边缘、受人防范且令人不安的面目。所有的百科全书都提到了针对小贩的法律，就连富兰克林也在他 19 世纪末编撰的《18 世纪以来巴黎的美术、工艺与职业史词典》里采取了相同的分类方式和保留态度。他说“行会总是疑心重重地打量着他们”，担心“他们企图以这种方式倒卖来路不明的残次品”^[3]。

在英格兰，这个词往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商贩” (chapman/cheapman) 原本是对买卖商品的人的总称。这个词前面经常加上形容词“小”，暗示了一种等级制的发端，也即那些在曼彻斯特和约克郡驾着马车飞驰全郡给店主发货的富商，与那些背负行囊辗转乡间的底层小贩之间的等级差异。17 世纪和 18 世纪上半叶，“小商小贩 (petty chapman)”被用来描述那些“低价批发买进商品，然后高价零售卖出，另外也将商品分包出去”的人。当店铺在市镇和乡村建立起来时，“商贩

(chapman)”顶多意味着一个带着商品挨家挨户走街串巷的人，是小販 (pedlar) 和叫卖者的同义词。^[4]这个词同样含有贬义：“叫卖……起源于鸟类或人类刺探消息、鬼鬼祟祟的习性，由此它还衍生出强取豪夺的恶名。”^[5]

西班牙管小販叫 Gabacho，意思就是来自北方山区的粗人。^[6]意大利管小販叫 merciajuolo 或 merciajo^[7]；提契诺地区记录在案的小販名称各式各样，像 mercante、girovagho、trafficante、cromero^[8]等。日耳曼每个镇的叫法都不一样，最常见的叫法是 Hauserier，此外则因其兜售方式而异：走路兜售的叫 Ganger，街上吆喝的叫 Ausrufer，蹲点的叫 Hockerer。明斯特地区的人们管背上扛包的叫 Kiepenkerle。有些小販贩卖小件奢侈品和非必需品，因此被称为 Tandler；或者他们干脆被当成江湖骗子，也就是 Gaukler。^[9]

到 19 世纪末，文学作品中的小販被描绘成流氓或骗子，亦商亦贼。他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既兜售日常用品又贩卖梦幻。他来自远方，拥有某种秘密知识，他的恶行能因他聪明的骗术而被抵偿。莎士比亚这样描述英格兰小販：“被单是我的专门生意……我的父亲给我取名奥托力格斯，他也像我一样水星照命，也是一个专门注意人家不留心的零碎东西的小偷……做小偷是我的唯一生计。”^[10]^①奥托力格斯的角色主要是流氓无赖而非小販。

1596 年，法国里昂出版了《行乞的波希米亚小販的富裕生活》(*La Vie généreuse des mercelots gueux et bohémiens*)。这本书在小販种种令人不安的差异中，刻画出其三种特征：小販使用秘密语言掩饰其行径，这点本书中有所揭露；小販是不诚实的商人，“换句话说我们会用商品欺骗绅士、年轻人，以及妇女、村妇和农夫”；小販是不折不扣的小偷，想入这行就得首先发誓“j’atrimme au passeligourt”（“一有机会我就偷”）^[11]。

西班牙黄金时代的文学也不例外，但凡小販出没之处，立即就会引起群情蔑视。弗朗西斯科·德·格维多 (Francisco de Quevedo)^②把他们描写成蚂蚁、蚂蟥

① 《莎士比亚全集》下册，《冬天的故事》，第 1760 页，朱生豪译，大众文艺出版社。——译者注

② 格维多 (Francisco de Quevedo)：观念主义的代表诗人。所谓观念文体，是指专注观念及文字组合后所得的概念，借着音近或一字多义的字眼达到文字游戏效果。格维多的诗作种类繁多，有讽刺类、哲学类、政治批判类、文学批评类，也有真诚动人探讨爱情及死亡的十四行诗。他最受欢迎的长诗的主题即属笑闹之作，在这类诗中，作者以其观念文体的手法毫不留情地将事实丑化扭曲，勾勒出一幅可笑的漫画。这种扭曲事实的手法，数世纪后可以在戈雅的画作及荒诞派作品中找到对应。——译者注

和虱子，其汲汲营营敛财逐利是对有身份人士的冒犯，只要这两种人碰到一起，故事结局肯定好不了。^[12]

“三个法国人跨过比斯开山去西班牙。第一个人脖子上挂着一把剪刀，背着磨刀匠的背篓；第二个人拿着两捆东西，分别装着风箱和捕鼠夹；第三个人带着一个托盘，里面装着梳子和发夹。走到山路最陡的地方，他们遇到一个肩披斗篷徒步前往法国的西班牙人。四个人坐在矮树丛荫下休息，接着就聊起天来……西班牙人说他们令他着实惊奇：带着货物不辞千辛万苦从法国赶来，跨越崇山峻岭和荒芜陌生的地界，还冒着落入强盗手里的危险。磨刀匠讲卡斯蒂里亚方言最清楚，他答道：‘我已经来过西班牙三次了，就带着这个背篓和这个简单的磨。在那里我挥霍了一大笔西班牙币，你们叫达布隆（doubloon）……你应该把磨刀匠看成陆上的舰队，是来磨细你的金锭银块的，而不是来磨刀的……’”就为最后这句话他被扔下了山谷。^[13]

这个话题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葛拉西安（Gracian）把法国人对西班牙人的行为和印第安的西班牙征服者的行为做了对比，发现共同点是他们都用便宜的次品欺骗对方。“对法国来说，西印度群岛哪里比得上西班牙？（所有这些）不用维持舰队，不用一枪一弹，不用流一滴血，不用开掘矿脉，不用勘探洞穴，不用减少法国人口，不用横跨大西洋……西班牙人是你们的红皮肤的印第安人，甚至还要大方，因为他们的舰队给你们带回的是精炼锻打好的银子，却发现换回去的是混充的银锭子，换句话说，他们被骗了。”^[14]与此同时小贩渐渐成为一个滑稽角色，他穿戴一套行头隐瞒自己的身份^[15]，向人提供闹剧和讽刺剧串场，还有数不胜数的笑料；这些角色多叫 Gabacho、Pierre、Juan Frances、Gascon，表示他们来自山区和法国。^[16]

19世纪，随着小贩这个行业逐渐衰落，文学作品中表现小贩的方式经历了一次根本转变。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眼里，小贩扮演的不再是传统上模棱两可、令人不安的角色，他们摇身一变成了民族英雄，成了保守的乡村道德的化身，对抗着城市的腐化堕落。^[17]法国的宗教文学则以截然相反的方式表现小贩：要么他是一个邪恶的形象，是人们该拒斥的诸般诱惑的化身；要么就是，他的自由、谦卑和智慧使他成了耶稣基督的代言人。^[18]

不难看出，想要研究小贩的历史，就要依赖这些大多来自都市视角粗略描绘和我们已经考察过的种种资料。布罗代尔笔下的山区同样适用于小贩：“它没有

历史……一个人一旦离开山区，离开它的模糊的历史面目，他就来到了平原和城市，来到了有分类档案的区域。不管他是初来乍到，还是又一个进犯者，山区居民总会发现自己被人评头论足，贴上种种滑稽可笑而又微不足道的标签。”^[19]^①实际上，对小販历史的双重束缚就在于，山区居民在城市居民眼里，在城市档案对他们的记录中，扮演着太多重的角色。至今有三种监督小販的资料：政府对小販人数的调查，这种尝试不过是徒劳之举；城镇之间的通信往来和急于撵走小販的定居商人的连天抱怨；法庭案卷和偶尔逮着个把小販的治安官的记录。

为了避免单纯的都市视角，必须先把城镇放到一边，抛开“巡回”这个概念，集中精力去寻找他们土生土长的地方，不论有多细微难寻；毕竟，这些无根漂泊的人一定曾出生在某处。我的目标是重新发现这些被定居者边缘化的人们的根源，以此了解导致他们被排斥和边缘化的种种途径。在小販们往返于欧洲南北、做着微不足道的贸易营生的背后，隐约可以看到广大的山区的影子。我执意相信，这些“造人工厂”（factories of men）——这恰是布罗代尔所重视的——有它们自己尚待发现的历史，只有通过研究迁徙者所发源的村庄，我们才能理解这些村庄为什么能连着几个世纪产生小販，并派遣他们带着城镇的货物，接二连三去往农村。因此，我回到商业迁徙的根源，回到山村，就是为了把个体的迁离与其所属的社会架构和人的架构融合到一起。由此小販的历史展露出双重面向：一面是他们家乡山区的历史，一面是他们既赖以发展又被边缘化的地区，两者不可分离。

下面是本书的结构安排：首先，以山区的日益重要性和日渐增长的人口为出发点，描述小販业的最初模式（第1章）；接着，追溯18世纪小販业的不同发展方式（第2、3章）；然后描述对小販充满弹性的类型学划分（第4章）；跟着再回到村庄，我试图理解村庄社会圈子的独一无二之处，正是它们构建了商业迁移和人与人之间信任的链条，超越了日常移动的限制；分析这些链条是如何断裂的（第5、6章）；从这种断裂中，产生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小販业结构（第7章）。最后，通过人与货物的流动，通过在不同地区和文化间不断往还，通过在行商、定居买主和待售货品之间模棱两可的遭遇（可以预见而冲突难免的遭遇），人们创造了独特的文化和认同（第8章），并最终改变了他们造访的共同体文化实践。

这个通盘计划的种种局限一开始就应指出来。一方面，研究迁徙这个领域的

① 布罗代尔，《地中海考古》，蒋明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作品是零碎的：小贩经济的组织从未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另一方面，这些人巡回上路被看成一种脱序——而且是以整体从山村往外迁徙的形式。这种脱序被当成一种调节多余人口的系统，就像人口的氧气瓶，同时也意味着共同体的萎缩。结果，历史学家写出了两种并列的山村叙事：留在村中的人的高尚故事，以及离村者不光彩得多的故事。我认为不能不假思索一上来就接受这种二分法，而是仍然要对其加以构建，因此我反对在村落共同体的组织中忽视对迁徙的整合功能的研究。换言之，就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欧洲小贩流动做比较历史研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现在却是赋予这个领域的历史学以焕然生机的时候，我想以多菲内的阿尔卑斯山作为入手点，通过与其他地点进行比较，提出一个小贩业发展的模型。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考虑（山村内外）相互间发展不同步，或是小贩背井离乡（取决于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过程中暴露出的重大差异，去质疑旧模型的种种特征。但愿这么做能够激发其他研究者尝试进行一种真正的关于欧洲迁徙商贩的比较研究。

本书试图在欧洲范围内和一个长时段内去理解小贩现象，到目前为止有关这一现象的研究都是零碎的。这是一个大胆的冒险。在找寻小贩业运行的机制和动力过程中，我的研究表明，传统上广为人们接受的小贩业处于经济与社会边缘化的图景，与这个行业和做这行的人们根本就不相符。但是由此产生的问题和带来的方法论反思，超出了巡回贸易本身的问题，而牵涉到那些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

因此，商人的迁徙活动成了消费社会形成史研究的关注点之一。直到 19 世纪中期，它还在欧洲商业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并随着像烟草、书籍这样的新产品的广泛传布，而与定点经营的发展齐头并进。围绕销售行为进行的仪式性交换，同时也是文化接触。通过旅行，小贩使三种文化力量正面相遇：来自边缘地区的人们，他们旅行到农村，流通城镇里最新的物品。他们是怎样利用既有的文化体系达到商业目的的？通过货物与家庭接触，他们对这些家庭的道德变迁和文化实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经商活动是否也反过来影响了这些迁徙的从商者的文化？

这一行业以迁徙和信贷为基础，同时也有赖于这样一个结构，即在其中能利用一切自由和边缘性法律的制度化形式。对它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弄清商业资本主义发展提出的问题，让我们了解信贷和国家在商业网络中扮演的角色。它还能帮助我们打破常用于迁入迁出研究而又过分简化的二分法，并使某些概念，像流

动、身份认同和相互依存,变得更加精细。

最后,小贩业打开了一条通向土地贫瘠的偏远农村的道路。在那里,共同体基于扩展家庭以及习俗和依存的纽带,确立了一种独特的结构。这种模式在今天的许多地方(主要是在但也不仅仅是在欧洲之外)依然存在。

本书是我在佛罗伦萨结成的友谊的产物。1987—1990年,我在这里结识了佛罗伦萨欧洲高等研究所历史与文化系研究员、莫奈研究中心研究员与讲师。1987—1988年,我在所里担任莫奈研究中心研究员,并开始写作本书,其中一些主要篇章已在1990年秋天的研讨会上发表。我要感谢系里人员,特别是 Franco Angiolini、Francisco Bettecourt、Jean Boutier、Philippe Boutry、Joachim Carvalho、Heinz-Gerhard Haupt、Dominique Julia、Wolfgang Kaiser、Dominique Poulot、Daniel Roche、Robert Rowland、Gabriela Solari、Stuart Woolf,以及我的朋友 Peter Hertner,他协助我处理了所有德文资料。

研究所图书馆历史组的负责人 Serge Noiret 给我提供了许多帮助,同时还热心与我分享他在相关领域的发现。

最后我要感谢对本书感兴趣并与我分享其各种见解的历史学家,他们是: Maurice Aymard、Roger Chartier、Geoff Crossick、Robert Descimon、Willem Frijhoff、Maurice Garden、Paul Guichonnet、Pierre Jeannin、Giovanni Levi、Renato Pasta、Ulrich Pfister、Jacques Revel、Bernard Vincent。

第 1 章

15—17 世纪间的小贩业与主要贸易

小贩业从其出现的那天起一直到 19 世纪中叶，都是由山区居民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对西欧而言，若是画出一张地图表明第一批迁徙商贩来自哪里，就可看出有三个主要发源地：整个阿尔卑斯山区（尤其是从萨伏依地区到蒂罗尔^①的高海拔村落），比利牛斯山脉和苏格兰。这些山区作为培育小贩的温床，有其中世纪根源。那时候，高低地互补的自然地貌建立起来，不仅使山区能够进入欧洲贸易圈，而且由于山区直接位于主要贸易路线之上，因而其地理位置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实际上，直至 17 世纪，阿尔卑斯山谷仍是边缘化地带：最繁荣稠密的人口聚居区都在低地河谷，那里有最适合谷物生长的土地。自 17 世纪以降，尤其是 18 世纪，欧洲经济发展充分表现在城镇扩张、驯服海洋和繁荣增长上，或者也可从新的衣服样式和饮食方式中观察得到。这恰好把山区从其边缘状态解救出来。从那时起，建筑和造船业需要木材供应；服装制造业对皮革和羊毛需求量持续增长；人们从日常饮食（不再是面包，而是种类繁多的食品，例如肉类）上来夸耀自己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这些新需求正是未开发地区像沼泽林地的特产。换言之，山地地区成了各类地域中的翘楚。^[1]

为了回应低地社会的不断变迁，山区社会也建立起来：畜牧养殖发展起来，小规模的季节性牲畜移动耕作建立起来，与此同时，一个草地灌溉系统在干旱山区也确立下来。围绕着这些活动，在山区边缘建立起了集市解决新的贸易需求。^[2]同时一个大规模季节性牲畜移动耕作系统（用乔治·杜比 [George Duby] 的话说

① 蒂罗尔 (Tyrol)：奥地利西部及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东部的一个地区。——译者注

就是“一个值得赞叹的人类构想”)也建立起来,这样一来,绵羊就能在冬季高处的山谷地区食物不足时,靠下面的牧草过冬。萨伏依地区加入了德国和意大利的行列,成为毛皮贸易供应者^[3];苏格兰则先是以羊毛挑战波罗的海地区,接着是皮革和毛皮,最后在16世纪末则是煤和盐。^[4]

一到18世纪头几十年,与山区产品不断增值一同出现的是许多山区找到了新角色,成了贸易路线。贸易分工建立起来:较重的食物如谷类走海路;奢侈品循着阿尔卑斯山等商路走陆路。骡队驮着丝绸、贵重染料、靛青及金丝银线走山路;每座山关隘口都有人来车往^[5];自从向导能够保证全年通行,贸易就如涓涓溪流般灌溉着山区,无论冬夏寒暑。^[6]这些“高耸的贸易路线”意味着商人可以避开厘金和关税,就像在阿尔卑斯山脉一样,在比利牛斯山脉也有“一个川流不息的商贩流逃避着关税”^[7]。对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市场而言,苏格兰东海岸的港口就像阿尔卑斯山关隘一样,派上了同样的用场。

因此,山区居民的流动不是人口过剩的结果,而是在充当着人类征服山区的不可或缺的角色。^[8]这一视角的全面转变非常关键,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迁徙运动的革新性质,理解那时靠近山关隘口、位于贸易线路的人口稠密的社会。早自中世纪,人们就利用这些线路往来于未开化山区和主要贸易轴线(由北向南自尼德兰经莱茵河谷直至意大利,由东到西自意大利经法国南部直至西班牙)。^[9]

后来从16世纪开始,其他主要贸易点也出现了:它们是连串的谷地,连接着山关隘口下的意大利湖区与法国中央高原^①。^[10]然而,利穆赞和奥弗涅的商人迁徙从一开始就没能进入这条双向商业流通环路。它一直与主要贸易线路保持距离,沿着其他线路发展贸易,其商贩活动的结构也与山谷地带或苏格兰的模式有所不同。我们将在下一章考察这一点。

因此,自中世纪以来,来自阿尔卑斯山谷的小贩就已出现在贸易路线上。北方的萨伏依人和来自瓦莱达奥斯塔^②的人们开始移动到瑞士高原和莱茵河中游的商贸中心。早在1336年,卖服饰用品的小贩(Krämer)已经出现在苏黎世;15世纪初他们已经掌控着苏察赫地区,到了15世纪末,他们就到达了弗里堡^③。^[11]萨

① 中央高原(Massif Central):法国中南部高原地区,大部分海拔六百到九百米。——译者注

② 瓦莱达奥斯塔区(Valle d'Aosta):意大利西北部一个地区,位于法国和瑞士边界,它于20世纪40年代从皮德蒙特分离出来,具有显著的法国语言和文化传统。——译者注

③ 弗里堡(Fribourg):瑞士西部一都市,为宗教及文化中心,位于伯尔尼西南部。——译者注

伏依的其他河谷（塔伦特与莫利安谷地）已经卷进东西向的贸易运动。多菲内、布里杨松内及凯拉等南阿尔卑斯山谷地带也包括在内，那里有许多家庭定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之间的商路上；即使后来由于南阿尔卑斯山谷许多家族改信新教，扰乱了既有安排，迫使贸易路线北移至莱茵河和宗教改革地区，这条商路仍然存在。16世纪，来自意大利湖区的迁徙商人不断移动：一些人前往北部与原初的小贩汇合^[12]，另一些人前往意大利南部，前往西西里^[13]。最后，自17世纪以降，来自南部的迁徙商贩，那些外国人^①，遇上从荷兰布拉班特^②涌入的北方商人。^[14]17世纪下半叶，从阿尔卑斯山高地到德国的小贩人数达到峰值，下个世纪这种状况由于来自意大利湖区的巡回商人不断涌入而得以延续。卡尔·马丁（Karl Martin）用定居人口的确切数字证明了萨伏依移民持续不断的增长。他们的数量在三十年战争^③后出现爆炸性增长，而在17世纪末叶则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15]，其后他们开始从瑞士德语区转移到布里斯高和黑森林。^[16]来自布拉邦特的迁徙运动在尼德兰起义期间暂告中止，直到18世纪初才又重焕生机。^[17]

苏格兰的商人、小贩、皮革匠和纺织工遍布整个北欧（波兰、丹麦、瑞典和挪威）。第一批定居者可以追根溯源至15世纪下半叶，那时在英吉利海峡两岸，在西欧、挪威和波罗的海地区已经发现了苏格兰人的足迹。1500—1650年，苏格兰人的迁徙达到高峰。^[18]其中，定居波兰的主要来自苏格兰北部和东北部大约一百四十个地方。他们大都是沿着海路到达，尤其要经由格但斯克和其他波罗的海港口。不过，自17世纪以降，一些人沿着德国与波西米亚的主要通路和河流，散布在整个波兰。这些人在17世纪上半叶还能确定来自四百二十多个地方。^[19]1621年，住在波兰的苏格兰外迁人口估计在三万人。^[20]16世纪最后二十年一直到17世纪上半叶（1580—1620）是移民高峰时期。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一股

① 外国人（welches）：德语中尤其指那些来自南部或地中海地区的人。——英译注

② 布拉班特（Brabant）：荷兰一地区和原公爵领地，1190年成为独立的公爵领地，现在分为荷兰南部和比利时中北部两块区域。——译者注

③ 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由于宗教、朝代、领土及商贸对抗等多种原因在欧洲进行的一系列断断续续的战争。全面战争主要是由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的罗马帝国和由瑞典荷兰反天主教势力支持的新教诸侯之间发生的斗争。冲突爆发于161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此后，欧洲的势力均衡被完全打破。法国成为主要的西欧强国，神圣罗马帝国的成员也完全独立，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欧洲基本结构已经形成。选自《大英袖珍百科》。——译者注

由商人、小贩和巡回手艺人组成的亚美尼亚人洪流涌入波兰东南部。^[21] 1518年，在瑞典马尔默 (Malmo) 的纳税人口中，苏格兰人占 2.6%，他们的数量一直增长到 16 世纪中叶，那时他们的数量占 3%，之后一直滑落，到 1596 年只占 1%。^[22]

无论我们是想从移民最早出发的地方还是从其目的地入手确定这些小贩的数量，都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他们作为统计证据，特点很不精确并有争议。乔安妮·奥格尔 (Joannes Augel) 和卡尔·马丁以在德国档案中确认意大利人和萨伏依人的人数为己任^[23]，但是他们提供的数据数字肯定是低估的，因为档案里记载的只是永久定居者而非临时移民的数目。然而，与这些不太可能的估算相比，还有许多蛛丝马迹能让我们更好地去推想，这些人在本地居民的生活及想象中的重要性。在浑斯鲁克、美因茨和法兰克福，“意大利人” (der Italiener) 与“商人”是同义词，即从事商业贸易的人；这种地理上的来源与职业活动的混淆深入人心，甚至一个德国商人会惊讶地发现，自己被称作“德意志意大利人” (Deutscher Italiener)；在丹麦，“苏格兰人” (Scot) 意为小贩——这些事实足以给我们提供另一种测量方法。与之类似，苏格兰人在波兰的广泛存在以地名的方式表现出来，像 Nowa Szkocja、Skoma Gora 等。^[24]

商人结构

至于小贩业的联系网络，其内部组织复杂，除非历史学家注明他们的地理来源，否则很难把握和理解，因此，直到现在对他们仍有很多误解。事实上，这些来源与传统视角一样，只能提供局部和片面的洞察。在低地视角看来，山区是“一个造人工厂，生产供人剥削的人”；地方政府记录他们从山区下至低地，观察家们注意到他们奇怪的服饰。^[25] 城市档案中有证据证明这些穷困潦倒的移民隐瞒了数目可观的财产，但在这些人死后搬出的账本和存货清单并没有揭开他们的秘密，这些材料只是披露了商人们与其他商人和市镇的贸易往来，都是很传统的那种，这些资料特别突出个人成功。但在山区视角看来，这些所谓的“其他商人”其实是他们的亲戚或同村老乡；“其他人”其实是亲戚或同胞。

通过分析这些移居城市的商人的活动，一个在两个层次上运作的商业组织浮出水面。第一个层次由亲属和姻亲构成。它支撑起一个家族银行体系，并且通过开大货栈和商铺，构成了城市广阔的地理网络的一部分。第二个层次是一个与迁

徙移动相联系的经销网络。它有一个严格的等级制结构，这一结构基于临时迁徙者和同乡人付出的劳动。多亏了城市档案所乐于记载的几个家族，我们才得以透视这些网络：塔伦特谷地蒙塔尼的毕托 (Bittot) 家族、多菲内谷地拉·格拉夫的基洛 (Girauds) 家族和安德烈·马森 (André Masson)、科莫湖^①阿尔卑斯山谷地的布伦塔诺 (Brentanos) 家族，以及其他阿尔卑斯山区和苏格兰的家族集团。

(1) 因此，在第一个层次上，我们这里有一个在广阔的地理区域从事贸易的家族网络。这个由塔伦特谷地蒙塔尼的毕托三兄弟促成的网络，是从1611年他们在斯特拉斯堡的“债务记录”中被重建出来的。它表明，他们的生意拓展至几十个城镇，它们全都坐落于威尼斯—里昂、里昂—哈勒姆^②、哈勒姆—格但斯克、格但斯克—威尼斯围成的矩形区域内。^[26]对这个家族的分析显示，这个组织自创立时起已历经好几代人，其创立得益于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与山区居民和主要业务地区商人家族的婚姻平衡。他们的父亲，也就是塔伦特谷地蒙塔尼的吉尔斯·毕托 (Gilles Bittot)，娶了斯特拉斯堡商人格奥尔格·赫尔贝克 (Georg Hellbeck，又名波希姆·朗西昂 [Boheim l'Ancien]) 的女儿，通过赫尔贝克居中协调，毕托于1576年被授予“市民权”^③。当时市民权非常重要，它能给人以在城镇经商的权利。毕托夫妇有九个孩子。两个女儿嫁给了外国商人：大女儿玛丽 (Marie) 嫁给一个住在斯特拉斯堡的法兰克福商人，他于1595年成为那里的市民；二女儿安妮 (Anne) 结了两次婚，两次都是嫁给在巴塞尔多做生意的萨伏依商人：第一任丈夫是萨缪尔·巴蒂耶 (Samuel Battier)；第二任丈夫叫让·萨拉辛 (Jean Sarrazin)，他丧妻后移居日内瓦。这三兄弟的叔叔来到斯特拉斯堡加入吉尔斯的行列，他于1585年也取得了市民权。在这个 (家族网络) 结构中，萨伏依人这一轴心一直是重中之重，因为三兄弟中丹尼尔 (Daniel) 和纪尧姆 (Guillaume) 双双成家并定居在蒙塔尼。另一个兄弟让 (Jean) 则定居在巴塞尔。

① 科莫湖 (Lake Como)：意大利伦巴第区湖泊，位于被石灰石和花岗岩山脉环绕的低地中，海拔一百九十九米，以自然环境优美和湖畔雅致的别墅闻名。选自《大英袖珍百科》。——译者注

② 哈勒姆 (Haarlem)：荷兰西部城市，位于阿姆斯特丹市西侧。1245年成为特许市，1577年并入尼德兰联省。17世纪臻于鼎盛，成为胡格诺派教徒的避难地和艺术中心。选自《大英袖珍百科》。——译者注

③ 市民权 (droit de bourgeoisie)：授予市民权相当于成为一个城镇市民或自治市市民，赋有若干特权，尤为显著的是贸易和经商权。——英译注

通过对 18 世纪初居住和工作在斯特拉斯堡的萨伏依人进行的分析，我们可以对上面勾勒的婚姻策略，以及在各中心之间进行的人力动员做一总体评价。萨伏依人吉拉姆·德罗兹 (Guillaume Droz) “曾在格勒诺布尔学习经商，然后来到这里娶了来自里昂的让娜·康努埃尔 (Jeanne Cannuelle) 为妻”；埃提安·罗曼内 (Etienne Romanet) “仍在贝桑松经营他的店铺，他已经干了七年了”；克劳德-弗朗索瓦·杜普伊 (Claude-François du Puis) “在里昂住了七年，他在那里以当地居民的身份做生意”。住在斯特拉斯堡的二十四个萨伏依人的妻子中，几乎三分之一来自萨伏依，而且相当一部分人仍然住在那里；第二大群体则来自阿尔萨斯。^[27]

基洛家族来自位于多菲内的瓦桑的拉·格拉夫。我们从让·基洛的记录本上得知，这个家族是一个新教商人网络的一部分。这个网络一直存在到 17 世纪末。它拓展到了整个瑞士、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在里昂、日内瓦、曼图亚及佩皮尼杨之间。^[28] 像他父亲一样，让在里昂开了一个店，他的继父则在日内瓦开店。基洛家族只是一个更大网络的一部分，在这个大网络里，另有几个来自同一山区彼此相关的家族联系在一起，如来自米佐昂的贝拉尔 (Bérard) 家族^[29]、德洛尔 (Delor) 家族、霍拉得 (Horard) 家族，以及维尔 (Vieux) 家族。托比·德洛尔 (Thobie Delor) 是里昂市民，也是颇有影响的宗教会议成员。^[30] 这个家族在日内瓦已经立足有一个多世纪，其家族成员安托万 (Antoine)、加布里埃尔 (Gabriel)、卢克 (Luc) 和埃提安 (Etienne) 都是来自米佐昂的服饰布匹店老板，他们于 1572 年成为日内瓦市民，乔治 (Georges) 则于 1597 年成为市民。^[31] 有关公证人的档案还披露出其他许多家族，他们定居在格勒诺布尔、勃艮第、意大利及通往西班牙和德国的沿途路上。所有这些家族都信仰新教。

布伦塔诺家族来自环科莫湖的山谷地带。它的网络形成依靠四个分支家族：布伦塔诺-格罗索 (Brentano-Gnosso) 家族、布伦塔诺-托齐亚 (Brentano-Toccia) 家族、布伦塔诺-齐玛洛里 (Brentano-Cimaroli) 家族及布伦塔诺-特勒梅佐 (Brentano-Tremezzo) 家族。第一批布伦塔诺家族于 16 世纪抵达，当时他们还是普通的小贩，是卖柠檬水果和香料的巡回商人。他们每年都带着柑橘和柠檬，大量往来行走于城镇、市集和周末市场之间，直至 17、18 世纪之交，他们才终于成功地在这里开店。第一个记录在案的布伦塔诺家族成员出现在 1640 年的巴塞尔，他在那里被驱逐，他的儿子卡尔 (Carl) 则在 1673 年出现在法兰克福。在这个家族的特勒梅佐一支中，马蒂诺 (Martino) 是第一个来到法兰克福的布伦塔诺成员。

1662年，他享有与年老体弱者一样的特权^[32]，获准贩卖柠檬水果，沿街叫卖或者摆摊设点都行。他的儿子多梅尼科（Domenico）1651年生于特勒梅佐，与他的妹夫合伙经商，最终于1698年在法兰克福开了家商店。不过他继续来往于法兰克福和他在科莫湖的家产之间。1723年，他就死在这片他家族生活的土地上。两代人以后，意大利的家族间联姻使布伦塔诺家族能够通过彼此之间的生意往来，在莱茵河流域发展起家族企业的若干支脉。马蒂诺作为多梅尼科（死于法兰克福）的长子也一直生活在意大利，并在那里生儿育女。我们得等到18世纪下半叶，也就是至少在有身份认同的第一代家族成员之后的四代人那里，马蒂诺的儿子安东（Peter Anton，1735年生于特勒梅佐，1797年卒于法兰克福）才决定融入法兰克福社会。18世纪伊始，布伦塔诺家族成员已经在阿姆斯特丹、宾根、布鲁塞尔、科布伦茨、科隆、康士坦兹、克拉科夫、迪亚兹、法兰克福、弗里堡、海德堡、曼海姆、美因茨、纽伦堡、罗滕堡、鹿特丹及维也纳等地区开业。如果再加上他们的亲戚开店营生的城市，他们的经营实体遍及整个北欧。^[33]最著名的家族分支来自特勒梅佐的乡村，其中诞生了克莱门（Clemens）和贝蒂娜（Bettina）这样的作家。从奥格尔和马丁编制的索引中可以看出，这些家族的历史与来自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谷地带的众多其他家族类似。事实上，18世纪以降从阿尔卑斯山脉的一端到另一端，这类来自无数村落的家族，我们都能列举出来。^[34]

苏格兰商人的迁徙遵循着相似的轨迹。丹麦艾尔西诺的商人彼此通婚^[35]，定居瑞典、格但斯克、柯尼斯堡及德国北部的商人也是如此。与此相似，他们也是从与其有亲密关系的家族中，从“自己人（同乡）”中挑选教父、教母。^[36]麦克利尔（Hans Macklier）生于苏格兰，1666年卒于哥腾堡，他叔叔在斯德哥尔摩做生意，与在波兰经商的苏格兰人一直关系密切；汉斯·斯伯丁（Hans Spalding）生于苏格兰，1667年卒于哥腾堡，他有个兄弟安德鲁（Andrew）在梅克伦堡开业落户。汉斯先把他的侄子雅各布（Jakob）派到哥腾堡，然后又把他安置在诺尔科平。^[37]这条通往成功之路始于在苏格兰小范围的沿街叫卖。这样赚得的利润让小贩们得以把他们的战场扩展至英格兰，成为当地的一个“旅人”或“旅行商人”，最终打进令人称羡的海上冒险商圈子。例如，马修·卡明（Mathew Cuming）曾在1683—1686年间羁旅英格兰。他从收入和信贷中获利。卡明给他的毛驴装上成捆的布料，然后带到伦敦去卖掉，所得不仅可以为他从荷兰进口染料提供资金，还能买下发自弗吉尼亚载着糖果和烟草的货船的股份。^[38]他就这样打入了大商人